

人物志

东汉末年，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统一了中国北方，开始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措施。这期间曹操大举军事屯田，得以在人民流离失所的动荡时期，集合起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开凿运河，兴建灌溉工程，使经济得以恢复，社会得以稳定。曹魏时期大兴水利，为隋唐大运河奠基，也是开创了后来海河、黄河、淮河流域诸多灌溉工程的先河，不仅对历史影响深远，更是中国水利史的重要篇章。

开挖运渠，为南北运河奠基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是为三国曹魏政权的奠基人。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立东行的汉献帝于许昌，开始“奉天子以令不臣”。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为扫除袁绍在河北的势力，建安八年，曹操向袁绍之子袁尚、袁谭固守的邺城发动进攻，这期间曹操开白沟，兴建了沟通黄河和海河的第一条区间运河。《三国志·武帝纪》载：“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曹操“遏淇水入白沟”的具体做法是，在淇水口（今淇县东西卫贤镇东一里）作堰横拦淇水，引淇水东流入白沟，使漕船由黄河登岸后陆运数十里后转白沟，水运至邺。《水经注·淇水》对白沟的描述更为详细：“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是以卢谌《征艰赋》曰：后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从《水经注·淇水》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曹操的白沟运口工程设施相当完善。《征艰赋》的“洪枋巨堰”和



□ 牛志奇

曹操治水

胜。征伐乌桓的胜利，奠定了曹操次年挥戈南下的基础，以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愿望。也正是在曹操得胜回师，途经碣石山时，写下了充满宏伟抱负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不朽诗篇《观沧海》。

曹操修复了黄河和淮河之间的运河。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遂至浚仪，治睢阳渠。”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修浚仪（今开封市）睢阳渠，这应该是从浚仪到睢阳（今商丘市南）的汴渠的一段，汴渠连接黄河与淮河，漕运可以由淮入泗，到彭城（今徐州）后可转入汴渠，西通黄河，这样将黄河与淮河水系连接起来。

曹操击败袁绍占领邺城后，将统治中心从许昌转移到邺城。《水经注·浊漳水》这样描述：“长安为汉之所居，洛阳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所以，曹操非常重视邺城的营建，进行了大规模营建工程，其中为改善邺城通向外界的交通，曹操下令开凿一条西起漳水东至白沟的运河，以补充白沟的水量，打通了邺城通向白沟，乃至北上的水上运道。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九月，作金虎台，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这个渠在《三国志》中没有说明是什么渠，但从《水经注·浊漳水》中可以得到印证为“利漕渠”，记载：“汉献帝

建安十八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利漕渠连通了漳水和白沟，由此，邺都水运可由漳水经利漕渠入白沟。曹魏时期还修建了白马渠，将漳水与漳沱河连通，修建的鲁口渠将漳沱河与派水连通，再北上与前文所说的平虏渠、泉州渠以及新渠连通。这是一个规模宏大、通江达海的水系连通工程，以邺城为中心，北上可以至海河、滦河各水系并直达大海，南可以通过黄河抵达江淮各地，邺城也因此成为黄河下游大平原上的南北水运交通的枢纽，得到了繁荣和发展。西晋左思所作《魏都赋》，描写邺城的景象不禁让人感受到邺城的繁华与巍峨：“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郭六七十里，远望苕苕，巍若仙居”。

在黄河与海河、黄河与淮河、淮河与长江各水系之间的运河工程多从三国时期开始，以白沟和汴渠为骨干，曹魏时期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运河体系。这些运渠，有的是军事进军的需要，如白沟、平虏、泉州渠，有的兼有灌溉效益，如广漕渠、利漕渠、白马渠等。三国时期运渠的开凿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成效上，都是空前规模的。曹魏时期运渠的开凿，用于发展漕运，对维系

曹魏政权的统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更是为隋唐南北大运河的沟通奠定了基础。

大举军事屯田，发展水利，奠定千年根基

东汉末年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土地荒芜、民不聊生。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为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恢复农业生产，采纳枣祗等人的建议，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制祇源于西汉，至曹魏时期得以发展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这是曹操开始实施屯田措施之始，在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魏书》：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列举了秦人发展农业和汉朝实施屯田的做法，对屯田高度重视，这样才能“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灭群贼，克平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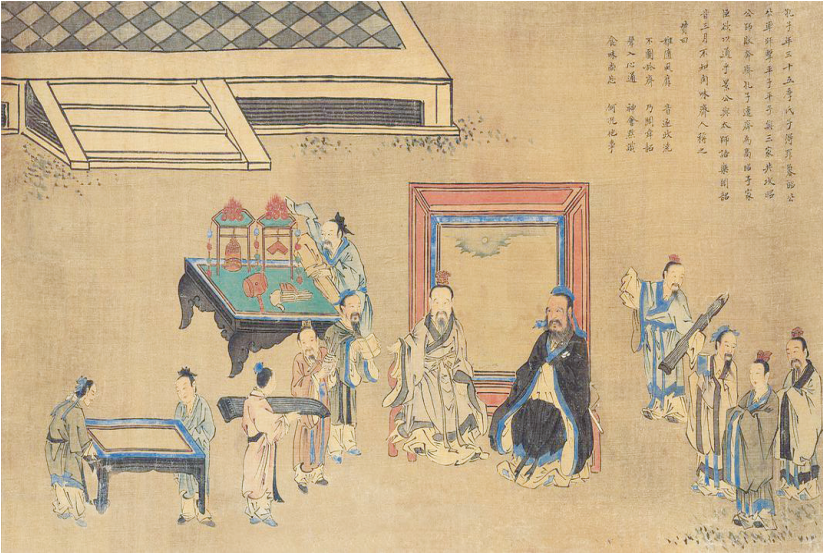
孔子讲辩证

□ 张文珍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主要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特别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合理的选择，体现出鲜明的灵活与变通的特点。

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将孝视为为人之本。《论语》第二章引弟子有子的话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将孝视为为人之道德品质的根本，对父母孝的人也会忠君爱国，如果人人为孝，则天下大治。可见，他认为孝是治国的根本，不可谓不重要。但是孔子并没有将孝绝对化、极端化，为人子女不见得要无条件服从父母，需要看父母有没有道理，如果父母无理要求也可以不服从。《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后来跟子贡说，国家如果有敢于谏诤的臣子，那么就不会出现大问题；一个家庭也是如此，“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即父亲有直言规过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孔子认为，不能一味盲从父辈，置大是大非、大义大理于不顾，单纯为了成就孝名，有可能陷父于不仁不义之中。正确的做法是敢于劝谏，据理力争，一切以是否合乎道义为准则。

重友情，却不主张过分亲密。孔子很重朋友与友情，《论语》开篇即提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把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视为快乐的事情。他对朋友的要求首先是正直，其次则诚实，再次是见闻广博，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会得益；相反与那些谄媚



奉承、口蜜腹剑、夸夸其谈的人做朋友，就会有害。他还提到“乐多贤友，益矣”，以拥有很多德才兼备的朋友为乐事。但孔子的交友态度非常理智化，他提醒人们交友要慎重，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强调交友要遵循忠信之道，不要与德性修养不高、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孔子认为朋友之间应坦率真诚，光明磊落，真心相待，认为那些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样子的人与行为，是可耻的：“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为鲁国太史，以秉笔直书、褒贬善恶著称，孔子认为交友之道也应如此。还有，孔子认为朋友之间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不分你我，取消界限，甚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朋友。“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就是说要尽心尽力为朋友提供必要的忠告，引导他向善，如果他不听从，也就罢了，不要自讨没趣。朋友是五伦之一，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劝善规过，是朋友的道义责任，但如果朋友听不进忠告，也就适可而止，否则有

可能伤感情，甚至会自取其辱。

好勇却不主张无谓的莽勇。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同时孔子也是一个十分有血性的人，他有许多令人激情澎湃的话语：“见义勇为，无勇也”“勇者不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等。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激励鼓舞了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而英勇无畏，奋斗牺牲。但孔子对勇的态度非常冷静理性，他时常提醒弟子们不要意气用事，而要谨慎，做到有勇有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意谓那种空手搏虎、赤足过河、盲目冒险、连死都不怕的人我是不跟他共事的。什么样的人合适？一定是遇见事情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唯恐有失，因此精心谋划，充分准备，最后获得成功。他这番话是针对子路说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曾给予子路很高的评价，说他颇具治国之才，但子路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好勇逞强，伉直鲁莽。对此，孔子不以为然，经常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

取材”。可见，孔子不赞成莽夫之勇，凭一时头脑发热，不讲智慧不计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人与行为为不可取。

不鄙视财富，也不刻意追求。孔子向来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子罕言利”。他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认为作为一名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他绝不反对物质利益与财富，认为求富求贵、嫌贫恶贱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如果通过努力能够获得财富，即使很普通的、一般人以为很低下的事情他也愿意去做，比如为人驾车，“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特别注重获取富与贵的手段，一定是正当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付出得来的，否则坚决不会去占有享受，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义正词严地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总之，正如《论语》所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孔子不凭空臆测，不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灵活变通、不拘泥、不古板之特点体现在孔子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这句古语原典出自《后汉书·虞诩传》，意思是立志追求不容易实现目标的人能够取得成功，做事不回避艰难险阻的人才能不断前进。

东汉安帝永初年间，朝歌一带叛乱四起，叛匪宁季等数千人连年聚众作乱，攻杀县吏，州郡一时都拿他没有办法，无奈只得上报朝廷。大将军邓骘因为与虞诩之前政见不合有嫌隙，一直伺机寻求报复，便主张让虞诩去朝歌任县令。当虞诩的亲戚朋友们都替他担忧时，他却坦然笑答：“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毅然上任的他，自然也不仅是一个“敢担当”的人，他最重要的是“善担当”。

虞诩到了朝歌就广招盗贼中罪行相对轻的一部分人，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并设宴款待他们，然后遣散他们出城，让他们投奔叛匪，做所谓的“向导”进城劫掠。然后设伏兵击之，斩杀数百叛匪。这还不算，他还让会缝绻的贫民故意被叛匪劫掠，这些“技术工”给叛匪修补衣物时，用红色丝线做标记。以至于叛匪即使是匿名出入公共场合，也会很快被官兵发现捉拿。导致叛匪以为神兵天降，惶惶不可终日，最终作鸟兽散，叛乱成功平定。平叛勇气之果断、思路之清晰、效果之显著，令人拍案叫绝。

虞诩“善担当”的妙绝之处就在于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完成战略目的，体现出他对时局、对眼前困难的精准把握。查阅资料后发现，《资治通鉴》中也有一则关于他的故事，同样体现了其“善担当”的一面。当时的东汉，边境长期受到西部游牧部落的骚扰，他们来如风，去如电，机动性极强，因此虽然只有几千之众，但仍打得汉军狼狽不堪。汉军屯步兵20万，旷日持久与其对峙，却占不到任何便宜。虞诩上书建议，不如让各郡士兵复员，让他们每个人出钱集资买马，20个人合买一匹马，组成一万骑兵。以骑制骑，以一万对数千，或追踪或

县令虞诩的『善担当』

□ 朱国峰

截击，游牧部落自然无计可施，最终会走投无路。其计之妙就在于虞诩看出了战争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搞冗兵那一套，而是选择建立快速反应部队，这样既提升对骑兵的打击力与追击力，也大规模节约了战争成本。这就是抓主要矛盾的智慧。

